

印尼對華外交政策的剖析

羅石圃

值此中共竭力爭取與印尼外交解凍的當前，耶加達對黃華、趙紫陽等的「東協」之行，都閉門不納，却於上（一九八一）年杪，邀請我行政院孫院長率同十四位官員前往訪問，使兩國有關部長，作了為期四天的商談。顯然無視於因此開罪北平，則頗堪玩味。至於印尼官方何以又在近年來，不斷聲稱將與中共恢復外交正常？且在孫院長賦歸後，外長莫達仍有印尼並未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的聲明。是則印尼未來的動向究將如何？這須剖視耶加達的對華政策，方可窺見端倪。

(一) 中立不結盟外策的來源

由羣島組成的印尼，除無人居住的荒島不計而外，是擁有三千五百個島嶼、九十萬方哩面積和一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其地位橫亙於赤道南北，分佈在三千哩長的弧形地區，鎖鑰印、太兩洋，為由東南亞通往澳、非、歐三洲的門戶，加以蘊藏的戰略物資極為豐富，向為列強所必爭。所以在二次大戰後，印尼解脫了三百多年的殖民地枷鎖，為了保衛國家永久的獨立自由，遂採取了中立外交政策，避免與任何強國結盟。

當五十年代後期，西方國家對印尼所標榜的不結盟政策頗表不滿時，曾經擔任過印尼副總統先後十二年之久的哈達 (Mohammad Hatta) 博士，在美國出版的「外交季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此項外策有所闡釋，其中指出：

「在自由運動中，印尼的領袖，要求人民努力以獲得獨立、主權、團結、公正及繁榮的國家，目前開國的奮鬥，在建立自由主權的印尼方面已然成功，因之政府主要使命，即為使國家團結、公正而繁榮。為完成上項使命，印尼需要其他國家的友誼與和平，乃屬極易瞭解之事。印尼雖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立國伊始、百廢待興，必須仰賴來自國外的物資與知識之援助，這是一個迫切的原因，使它採取要作大家的朋友，而不作任何人的敵人的政策。它的理念以及全體人民的宗教感，使它能以既與西

方國家合作，而又不憚於與共產國家論交。它深切了解共存和不干涉政策的真諦，因之，儘管若干國家的思想與印尼的不同，只要彼此不干涉對方的內政，一定可以和印尼並肩的和平共存^①。

誠然，印尼正由於它戰略地位的重要，及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在自由與共產陣營對壘情勢下，便唯有採取中立外交立場，方可在獨立後百廢待興之際，使所需要的經技外援，可以左右逢源，而又不致受到任何強權的控制。當蘇加諾執政期間，便是藉此而獲得了極多的援助，不但軍經援助源源而來，使其海軍在東南亞國家中後來居上，且兵不血刃而兼併了荷屬的西伊里安。不過禍隨福至，如果不是蘇哈托於一九六五年，指揮陸軍粉碎了由中共為印共安排的「九卅」政變，則此一羣島之國，即已先印支三邦而沉沒於赤浪紅流^②。

(二) 蘇哈托政府採取中間偏右立場

一般多已了解：共產國家所強調的「中立」、「和平共存」、「互不干涉內政」，只是爲了唆使自由國家推遠西方國家，並在軍援斷絕及沒有協防的情況下，指使支援其分佈在各國的共黨起而奪權。在蘇加諾執政時代的印尼，既已由於輕信共產國家的宣傳口號，幾乎造成了此一羣島國家變色；照理，蘇哈托繼起執政後，痛定思痛，便應該放棄中立不結盟外交立場。但何以他仍然對此項外策鍥而不捨？

其實在哈達的文章裏，也曾指出與共產國家「互不干涉內政」以達成「和平共存」，大大不易。不過這在印尼，則另有安內的構想，可以制使印共無法興風作浪，共產國際自亦無所作為，他說：

「我們深知作到不干涉，確有許多困難，由於在共產國家中，一切事務均由政府監督，言論表達自由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民主國家，斷沒有干涉它內政的可能，但在民主國家則又大不相同，例如即使蘇俄和另一國家訂有共存而互不干涉內政的協定，並確實遵守，但那個國家的共黨，却非服從來自莫斯科的命令不可。」

由這一段話，即已表明了印尼在蘇加諾時代，便已洞燭了與共產國家謀求以互不干涉而達到和平共存，仍然無法阻止共產勢力的滲透伸入。然而它又何以熱中於不結盟外策？是否想對共產與自由國家的友誼一視同仁，俾以左右逢源、來者不拒的立場而爭取外援？是不是無視於共產國家指使印共陰謀奪權？在此一方面：當年耶加達也有其對策，哈達文章裏也有所闡明，其中指出

註① [美國外交季刊]，一九五八年四月號。

註② 「印尼九卅政變真相」(Indonesia: The Gestapu Affair)。阿諾德·布瑞克曼 (Arnold C. Brackman) 著。[共黨問題研究] 月刊，七卷，八一—九期，張允德譯。

：印尼所仰仗的，是「公民的自由精神以及責任感——認爲當一個民主國家，能够給予其人民以豐衣足食的生活時，共產主義的影響就不會太大」、「當工人階級生活在困苦邊緣時，他們的態度是『革命』的；至他們的社會環境改善，其『革命』精神就隨之消逝，態度也改爲漸進的發展……」^⑧。

哈達這篇論文所闡述的印尼不結盟外策，由於北平指使印共發動一九六五年「九卅」政變，幾使此一羣島國家沉沒於赤浪紅流的慘痛教訓，照理應該改絃更張。惟印尼現政府的外策，固然已修正爲親西方，不過並沒有放棄不結盟的中立主義。爲了爭取友邦的經技支援，以便使印尼由貧窮落後而變爲富庶繁榮，使共黨發展的溫床因而喪失，印尼對於外來援助，只要沒有陰謀詭計，都極表歡迎。這也許是印尼現政府對外政策的主要任務。

(三)馬立克強調的獨立外交贏得軍民擁戴

蘇哈托於一九六五年平定「九卅」政變後，從蘇加諾手中接掌政權，在內政方面，卽羅致大批留美專家組成「開發內閣」，致力於國家經建以求富強；同時解散「粉碎馬來西亞指揮部」——此乃北平針對蘇加諾的狂妄企圖。夥同後者利用印共所組成的武裝特務機關，旨在阻止東馬兩州加入大馬聯邦——且從而訪問馬、新，化敵爲友。嗣又聯合菲、馬、新、泰與印尼組成「東協」，加強經技合作，文化交流，但不涉及軍事聯防，同時大量接受美國及自由國家經技支援，並竭力爭取日本及亞太自由國家投資設廠，開拓貿易、輸入科技新知。

在另一方面，蘇哈托政府在全印人民的反共怒潮之下，曾對印共份子及其同路人均給予殘酷報復，其中不但中共駐印使領人員成爲報復對象；卽廣大華人亦在忿怒的排華風潮之中，遭到了池魚之殃。所以耶加達新政府當時斷然宣佈與北平外交關係凍結，所有中共使領人員都被勒令撤出印尼，連商務往來，亦在所不許。至於印俄關係，則只將外交降級，蘇俄駐印使領館並未關閉，此固然是基於莫斯科並未插手印共的「九卅」政變陰謀，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蘇俄爲印尼十億美元的債權人，加上印尼三軍的裝備武器大都來自莫斯科，零件與彈藥補充都不能不仰賴蘇俄。對隔海相望的河內赤色政權，印尼並不歧視，仍然維持關係正常，其立場並不隨華府及河內的鄰邦而轉變。

一般多不了解蘇哈托執政後，對前政府官員大多不予錄用，唯獨垂青於蘇加諾時代的外交政策製訂人、且曾出使過蘇俄多年的亞當·馬立克？初則選任他出長外交，繼後又升任副總統。據法國「政治科學基金會」「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蓋拉·布朗夏

註⑧ 同註①。

(Cayrac Blanche D) 教授指出：馬氏之所以被蘇哈托選任外長，正是由於他與蘇加諾具有淵源，此既可對蘇加諾餘黨產生綏靖功效，使內部衝突得以緩和；而在軍人內閣中，有此一文人執掌樞機，對若干右派將領亦大可制衡，避免過於依賴美援而失去外交自主。

布朗夏教授接着指出：在蘇哈托總統堅決鮮明的反共立場之下，由馬力克實際執行印尼的反共外策，正好利用其曾任駐俄大使的存留形像，維繫印尼與左翼國家的關係。彼此互相配合，可謂相得益彰。當蘇哈托總統第三次連任時，馬立克即由外長而提升副總統，此即表示馬氏在其外長任內的成就非凡，切合了印尼人民及軍方的喁喁之望^④。

(四) 中共對印尼的威脅利誘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印尼的外策，自獨立開始，便是致力於爭取友邦給予經技援助，開發天然資源，俾以飛躍的步伐使此羣島國家由貧窮落後而成爲富強。由於其戰略地位及豐富資源，印尼乃爲列強所必爭，在對外關係上偶一不慎，便很容易喪失獨立自主。因此印尼堅持中立不結盟外交，對任何國家的友誼支援，無分左右立場，來者不拒。但由於中共與蘇俄針對了蘇加諾稱霸東南亞的狂妄企圖，其援助都含有毒餌。尤其北平使用與印尼平分東南亞之詭計——由中共支援印尼吞併馬、菲、新，以致印共擁有破壞大馬的地下武裝，得以發動「九卅」政變，幾使印尼沉沒於紅流。這是蘇哈托執政後不敢或忘的痛苦教訓，但又斷不能放棄中立不結盟外交立場。

印尼共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荷人史尼福萊 (Hendrik Sneevliet) 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而建立的，在蘇加諾的庇蔭下，除擁有三百萬黨員外，在農民、學生、勞工及文化等組織中，又有同路人一千兩百萬之衆，雖在「九卅」政變流產後，經過軍方與廣大民衆忿起掃蕩，對其各級組織都已掃穴犁庭，共幹與黨員和附從者幸而逃脫斧鉞或被囚禁的亦有數萬人，但其殘餘並未肅清。除了親「華」的印共在北平建有組織，且早已滲入爪哇等地從事活動而外，另一股親俄派印共，也在莫斯科扶掖下，由建立於新德里的總機關，伸入印尼各階層，並利用其潛伏在各單位的左派份子，俟機興風作浪，企圖死灰復燃^⑤。

蘇加諾的餘黨，始終迷信容共政策，尤其沉醉於與中共聯手，期使印尼在東南亞海域建立霸權。甚至在一九七一年二屆大選時，「國民黨」領導人蘇朋諾不但主張與中共外交解凍，且表明該黨並不拒絕共黨份子參加^⑥。此外北平對耶加達的威脅利誘，

註④

「印尼的外交政策及其展望」，〔法國國防月刊〕，一九七八，八—九號，蓋拉·布朗夏 (Cayrac-Blanche-D) 著。

註⑤

「印尼共黨似在死灰復燃」，〔華盛頓郵報〕，一九七〇、一、廿六—廿七、卡諾 (Stanley Karnow) 撰。

註⑥

「印尼普選大勢」，一九七一、二、廿一、中央社駐印尼特派員蘇玉珍耶加達航訊。

更是雙管齊下。在華國鋒公開召見印共代表團，並大事宣揚繼續給予支援之後，中共又籠絡印尼商會在香港談判雙方直接貿易通商。由於大陸輸入印尼的貨物，都是經由新加坡與香港商家轉口，致使印商認為如果直接通商，既可不必損失轉口利潤，且可為印尼農產品開拓大陸市場。因此印尼商界與恐懼北平支援印共捲土重來者，常對耶加達政府施加壓力，使其不得不對解凍與北平關係有所表態。一九七七年繼印尼外交官與中共外長黃華在聯合國會談之後，耶加達又派遣觀察員隨同商團前赴廣州參加交易會；翌年又有印尼農業部研究局長沙迪金博士率團悄然訪問北平^⑦。這些都是耶加達與北平藕斷絲連的例證。

(五)對北平何以若即若離

回顧耶加達所表明的將與北平恢復外交正常的言論，一直都是反覆無常，令人無從捉摸。但每逢大選之際以及蘇俄勢力進逼之時，都會促使印尼官方表示即將與中共修好，藉以緩和國內的輿情，或向莫斯科示警。因每值印尼大選，蘇加諾餘黨便不惜被印共潛伏份子所利用，藉口反對政府大量接受外資造成貧富日益懸殊，從而興起風潮，故蘇哈托政府不得不表示將與中共修好而加以安撫，冀收釜底抽薪之效。此外是蘇俄在東南亞扶助越共伸展霸權，使「東協」國家深受威脅；而蘇俄駐印尼的使領人員及商務代表，又多屬特工份子，暗中扶助親俄派印共擴張活動。爲了配合治安單位驅逐俄諜及逮捕共黨份子，印尼外交人員亦表出即將與北平復交的姿態，用以警告莫斯科。

一九七七至八〇年，是印尼與中共接觸最頻繁時期。副總統馬力克既曾表明雙方復交已沒有難題，只等待何時按鈕；出身軍方的外長莫達亦稱：耶加達和北平恢復關係，僅屬時間問題；而日本「共同社」從北平發出的消息，更謂華國鋒正準備訪問印尼^⑧，此一期間，由於河內挾俄援進侵高棉，中共乃出兵攻入越北，迫使侵棉越軍不敢進侵泰國。「亞西安」國家對此一致稱快，主張與北平聯手反擊越俄，耶加達自不能不與夥伴國言論合拍。再加上國內沉迷於聯中共以制蘇俄的蘇加諾主義抬頭，而印尼政府又正在進行將俄製軍事裝備武器汰舊更新——全部更換歐美國家產品，所以更不能不以將與中共復交的表態而向蘇俄示警。一九八〇年四月，印尼擴大紀念「萬隆會議」廿五週年及建立蘇加諾墓碑，其作用也是如此^⑨。

繼後印尼官方表明：與北平復交，只須等待所餘的八十萬華僑歸化手續辦畢，即可採取行動。此項歸化工作最近已經順利完成，然而耶加達對中共總理趙紫陽的印尼之行，却閉門不納，旋即邀請我行政院孫院長率團往訪，而出面邀請的又正是印尼中立

註⑦ 「略談中國與印尼復交問題」，一九七九、十二、九，〔南洋商報週報〕、二版、方磊撰。

註⑧ 同註⑦。

註⑨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四、廿四、二版。

不結盟外策的製訂者、副總統馬立克。這是否在向北平表明：耶加達無意與它恢復正常關係？至於耶加達公開反對華盛頓以裝備、武器售予北平，更屬對中共極不友好。這又是否表示印尼的對華政策，有了某種程度的改變？

儘管蘇俄利用越共在東南亞所造成的威脅咄咄逼人，儘管「東協」國家之中也都大願與北平聯手反霸，但蘇哈托總統仍曾於去春面告到訪的美國國會議員稱：「在長期的威脅方面，來自中共的大於蘇俄」^⑩。由此即可窺知印尼斷不會墜入中共的反霸統戰殼中，也可說明耶加達所聲稱的將與北平復交，甚至見諸禮貌接觸或談判行動，都是另有作用的表態。

(六) 耶加達重視臺北的來由

若問印尼何以如此重視爭取臺北的友誼，且無視於開罪北平？關於此一問題，我們可以從幾個層面求得解答：

1. 印尼的外交任務，是在爭取友邦，獲得經技援助，俾使此一急待開發的國家能够迅速繁榮，且須在由貧而富的過程中，不違背建國精神「五大柱石」中的——「社會公平」原則^⑪。當獨立初期，蘇加諾政府迷信蘇俄與中共的經建方式，曾以建設重工業為始基，企圖吸取莫斯科和北平的經驗，遂造成了經濟崩潰，民不聊生；至蘇哈托執政，始由「開發內閣」改轍易轍，走向自由國家經建道路，大量接受美日等自由國家經技援助，吸引內外資金投注。數年之間，印尼的通貨膨脹由百分之六百，降低為百分之八，其大量的外貿逆差亦轉為順差。惟在一片繁榮的都市以外，廣大農村仍然落後如初，以致國內興起了反對貧富懸殊的聲浪，且指責政府的建設，徒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更貧，違背了「社會公平」的建國精神原則^⑫。因此，如何使自由經建達成均富，又是耶加達的重要課題。

2. 新興國家的經建，固然需要外國的經技支援，但更需要的，為獲取借鏡，以便有所效法。日、德在戰後復興之迅速，乃因此兩國具有深厚的工業基礎——尤其擁有眾多的技術員工，這都是印尼望塵莫及的。以農業為主的印尼，在經建方面，允宜以農林漁牧為優先。中華民國在臺灣所實施的經建，係以發展農業為起點，先以農產支援工業進展，再以工業幫助農業現代化，經建起飛帶來的繁榮，已使廣大農村與都市人民普沾澤惠。此種「均富」政策，正合於印尼建國精神五大柱石中的「社會公平」原則的要求。同時，臺北將經濟繁榮所獲得的龐大稅收，用之於「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使寡孤獨老弱貧病都有所歸養，此又適合於印尼立國精神的「人道主義」原則，這便是印尼於凍結與北平關係後，其朝野人士紛紛來到臺灣參觀訪問，並開拓經貿關係

註⑩ 中央社V記者王勤紐約電，一九八一、三、十六，引述《時代雜誌》外交記者塔波特，於結束東南亞訪問後的報告。

註⑪ 印尼立國精神的五大柱石——①信奉全能上帝；②人道主義；③民族主義；④民主主義；⑤社會公平。

註⑫ 「印尼政府面臨挑戰的剖析」，本刊第十九卷、第十二期、拙著。

，增進文化交流的來由。

3. 臺灣經建的突飛猛進，為中華民國政府實施三民主義的成就，而三民主義對印尼知識份子並不陌生。蘇加諾本人當年更曾以醉心於 國父遺教且有深入研究而自命。他所開的此項講座，不但普及印尼各地，且曾應中共之邀，前往北平講演 國父遺教研究心得。雖然他將印尼所實行的「指導民主」，附會於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訓政時期」，從而變成了他獨裁的掩護，導致禍國殃民；但三民主義在印尼知識份子心目中，則已播下了種籽。他們當時只就憂三民主義不易實施，加上中共誣我政府在中國大陸時期並未遵從三民主義的中傷，更使他們難以確信此一主義能够立竿見影。但等到這批學者專家親身蒞臺考察研究後，才相信三民主義確能為全民帶來福祉。

例如印尼生態學專家蘇瑪爾多禾博士，在向國會所提出的報告中，即列舉我在農業發展方面的研究改進，成就輝煌，為歐美各國所不能趨及，大可值得印尼學習^⑭。又如中華民國農技團在印尼建立示範農村，從事綜合農業經營，提供技術援助，由於成績卓著，贏得了印尼朝野的口碑載道，以致在期滿後一再延長，並擴大工作範圍^⑮。這不過是印尼與我國十多年來經技合作的點滴，由此即不難了解為甚麼耶加達在對華政策方面與北平若即若離，而對臺北的友誼則與年俱增。

(七) 印尼的華人歸化問題

衆所週知，在印尼的三百多萬華僑華人，經常成為印尼偏狹民族主義者的衆矢之的。耶加達政府對不時興起的排華風潮，實屬困擾不堪，為使八十萬尚未取得印尼籍的華僑歸化，印尼政府特放寬歸化條件，規定彼等於提出申請後便可入籍。中共為迎合此一政策，即允許此等華僑放棄雙重國籍，以便籠絡印尼和它迅速復交。耶加達在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已將八十萬華人入籍手續辦理完竣，但並未採取行動以與中共恢復正常關係，反而於十二月杪邀我行政院孫院長率團訪問印尼，等於是更加推遠了與北平的距離。這對印尼廣大的華人有何影響？

其實印尼的三百多萬華人，對此一羣島國家開發的貢獻功不可沒。印尼獨立以前的排華風潮，乃出於殖民政府的陰謀挑撥；一九六五年「九卅」政變後的排華事件，則起於印人的報復中共而殃及華人。繼後此項風潮的不斷掀起，則是由於北平的從中煽動，或出於蘇俄的幕後安排。中共一向在東南亞國家利用「民族解放鬥爭」策略，一面鼓動華人爭取政治地位平等；一面又煽動土著，仇恨華人，並指摘華人的財富乃由剝削土人而來，所以必須剷除華人剝削階級，方可改善土著生活，至於蘇俄，則強調東

註^⑭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八、六、卅、三版。

註^⑮ 同註^⑭。

南亞的華人多屬中共的第五縱隊，唯有驅除他們，方可將北平地下勢力消除。這種挑起他國各民族相互鬥爭的手法，實為共產國家為赤化他國而興起羣衆戰的共同策略。

印尼自蘇哈托執政以來，大力爭取外資投注與技術轉移，但規定外人設廠必須與國人合夥經營。擁有印尼籍的華商在工商業方面有其傳統及力量，乃被外商認為合作的主要對象，以致他們和外國投資者都獲利頗豐，生活享用，亦不亞於外商。因此，印尼偏狹民族主義者、回教極端份子和野心政客，指責經濟起飛喪失了主權，違背了立國精神的民族主義，再經共黨潛伏份子推波助瀾，遂致排外事件層出不窮，且都會牽涉到排華風潮的興起，而出面排華者，又大都具有打擊北平的用心。上年三月，中爪哇排華暴亂剛被救平，印尼「自由日報」即著文指控中共在東南亞吸收大量僑滙作為顛覆各國的財源^⑮，即為一例。今後印尼政府如何促使堅決反共的印人，不再為共黨與野心政客所利用而興起排華風潮？如何使廣大的印人都能相信印尼華人站在堅決反共立場而彼此團結合作？這又是耶加達爭取臺北友誼的另一原因。

蘇哈托政府的重視華人。可見於一九五七年正當印人興起反共反北平的怒潮波及華人之際，馬立克外長在其對學生羣衆的講演中，即警告他們斷不可忘記華人在印尼數百年來的工作貢獻。他說不但印尼的經濟開發不能不借重華人，且因東南亞有華人所形成的經濟網，如果在印尼的華人受到歧視，勢必影響政府吸收華商投資^⑯，就一九六七至八〇年印尼所獲得的外資數額而言，來自香港及東南亞華商的投資，已高達八億九千萬美元，僅次於日本而居第二位^⑰。在政治方面，執政黨一開始便吸收了以華人為主的外裔印人，組成了「印尼籍民大家庭協會」，並選任華人呂光正為理事會常務主席，在各省市縣都設有分會^⑱。執政黨在歷屆大選中的大獲全勝，華人都有一份功勞。可見耶加達遠北平而親近臺北，對印尼處理華人政策而言，乃轉禍為福。

(八) 兩國的實質關係將步入新境界

我國與印尼的實質關係，可說十分親密；經貿與技術合作已顯示與年俱增。前途的展望，確屬非常光明。從貿易看：一九八一年前十一個月，雙方的貿易總額，已達八億四千一百八十萬美元，耶加達獲得了五千八百萬美元的順差^⑲。從技術合作看：我

註⑮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一、三、廿四、四版。

註⑯ 「當前印尼華人問題」，本刊、第七卷、第三期、鍾賢濱著。

註⑰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一、七、十一、三版。

註⑱ 「印尼大選情勢」，〔中央日報〕，記者邢頌文耶加達航訊，一九七一、六、廿四、二版。

註⑲ 「我與印尼經貿關係邁入新境界」〔臺灣新生報〕，一九八二、元、三、二版，刊載八中央社駐耶加達記者朱維瑜航訊。

國兩個農技團在印尼的泗水與日惹協助當地農民種植高價作物，實施水土保持，建立灌溉系統，和使用沼氣，使當地農家的收入增加了八倍至十倍，更贏得了印尼朝野的一致歡迎，這些都是對印尼有利的。我曾投注資金設備及技術，參與印尼石油、煤礦等的開發，再輸入所開採的成品，這對雙方均屬有利。且在印尼經濟繁榮購買力增加後，我國的工業產品可在印尼增加銷路。如一九八〇年，我出產的電視機，即有十五萬臺在印尼銷出，預料今後雙方的貿易，自會繼續發展^②。

再就印尼正在實施的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九年四月開始，至一九八四年三月爲止——來說，其重點爲優先發展石油探勘、石化工業及對民生有關和有利外銷的工業製品，其次爲發展農業——包括增建基本設施、區域發展和人口移墾等。我「中油公司」除已在印設立「海外石化投資公司分公司」，參加探勘開發工作而外，並協助「印尼國營石油公司」增產液化氣，以增加其石油產品的輸出。至於農技方面，基於我農技團在印尼工作的成果輝煌，雙方又已決定在爪哇增派第三個農技團，爲改進當地農業，提供服務。

此外是我國民營企業參與印尼經技合作的發展。兩國政府已就我中小企業入印投資設廠問題交換意見，耶加達興趣甚高。如此一方面商得了具體結果，我民間中小企業將會更積極參與印尼輕工業發展。接近一億五千萬人口的印尼，急待開拓勞力密集工業，俾增加就業機會，我國正在這方面提供援助。上年杪我孫院長訪問印尼時，不但偕經濟部長及次長、外交部次長及中油公司負責人同行，且在抵達耶加達後，除孫院長與蘇哈托總統及馬立克副總統數度談商外，其隨行人員更與印尼有關部次長分別洽商；而我經長趙耀東氏在孫院長離印尼時，並未能隨同賦歸，仍被挽留在耶城繼續商洽合作事務^③。由此可見此次孫院長率團訪問印尼，絕非如外電所傳係屬於「渡假」之性質。再由孫院長返國後向記者表明：此次印尼之行十分成功，更可推知今後兩國關係，勢將步入新的境界。

(九) 結 論

印尼的外策，原是指眼於爭取友邦經技支援，俾使此一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國家，能够迅速開發而達成繁榮。惟在蘇加諾當政期間，曾因想左右逢源而引進了中共輸入的赤禍；在蘇哈托反共政府成立後，又因大量吸收自由國家投資，造成了貧富不均，以致共黨潛伏份子利用偏激者和野心家，藉口「社會公平」原則，抨擊政府實施經建的偏差。加以華裔印人與外商合作而獲巨利，更被指爲有利於中共，而經常興起排華風潮，耶加達面對這些重重困擾，遂不能不在對華政策方面，以謀求趨利避禍爲首要課題。

註^② 『孫院長的印尼「假期」』，臺北〔聯合報〕，一九八一、十二、十，記者馬安一撰。

註^③ 同註^②。

印尼疏遠中共而接近中華民國，既可在經建上獲得達成均富目標的借鏡，又能取得臺北善意的經技支援。而且兩國經技合作與雙邊貿易的拓展，已使國民外交與年俱進，在印籍華人均能心向臺北的情況下，廣大的印尼人民，也怯除了其國內華人效忠北平的懷疑。無論從那一角度着眼，耶加達在對華外策方面，選擇了親近臺北而與北平若即若離，對堅決反共的印尼而言，實屬有利。不過以往耶加達每逢大選前夕，都是以即將與中共復交而安撫國內蘇加諾餘黨。今（一九八二）年四月，大選又將舉行，而耶加達却在此之前，邀請我孫院長率團訪問，無視於開罪北平，此可顯示蘇加諾餘黨勢力已告消沉，親北平的印尼共黨亦已無所作為。就耶加達與臺北的關係而言，這也是一項有利的發展。

新書介紹：「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恭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二十餘萬言，25開本，三百餘頁，歡迎惠購。

每冊實售：新臺幣 一〇〇元
美金 五元

郵資另加：國內（郵掛）新臺幣一〇元
國外—平郵 美金三元
航空 美金七元五角

郵撥帳號：三四三六號